

荐读

霍洛柴登怀古

——读《西河郡与霍洛柴登古城研究》有感

冯杭生

近日,读《西河郡与霍洛柴登古城研究》一书,不由有几分感慨。

1971年,霍洛柴登公社北面一公里的地方车辆众多,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人群将汉代古墓发掘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不断地将各种文物从尘封的墓穴中取出。陶盆、陶罐、陶壶、钱币,让围观的人大开眼界。

公社招待所院内搭起来数个帐篷,里面堆放着刚刚出土的文物。文物太多,好多东西只能堆放。坛坛罐罐,汉砖瓦瓦,还有一些叫不来名字的东西,层层叠叠地在帐篷里堆积如山。

一个小男孩在帐篷的窗口上好奇地往里看。这些陌生的器具让他生出了好奇心。小手不由自主地伸向窗口的一个陶罐。太不小心了!那个陶罐被触碰而倾斜,随即就发出来一连串落地、破碎的声响。破碎声将小男孩吓得手足无措。

小男孩被吓坏了,转身就跑。开始是因为害怕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此事,后来就把这事忘记了。等到此事再次出现在脑海里时,曾经的小男孩已经年届花甲。

55年,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从初为人子到乐享天伦,这是一段漫长而厚重的岁月;55年,从蒙疆边到新中国成立,从分庭抗礼到民族共融,这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微乎其微的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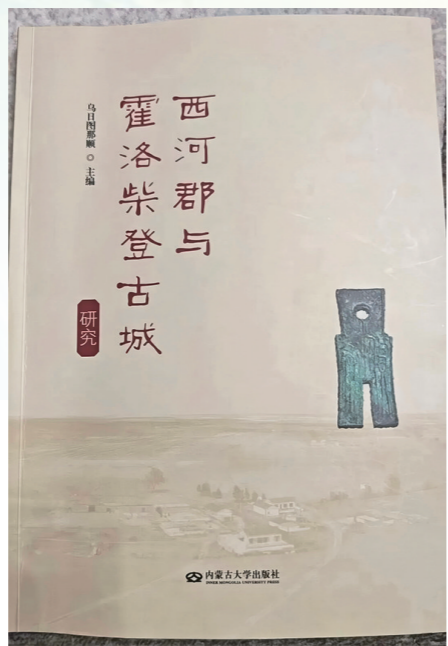
是在阅读《西河郡与霍洛柴登古城研究》时想起了55年前的这件事。想来,人的一生何其短暂而渺小。

霍洛柴登,我家在此居住过六年。记忆中我家的房前有一个邻居们共用的垃圾坑,那是一座被开挖的墓葬。父亲是公社的厨师,公家储存糜子的地窖是一个画满壁画的砖圈的墓窟,而放土豆的窖是一个土窑洞式的墓穴。已经上学的哥哥姐姐会在周末带着我们去到古城遗址上捡拾铜钱、小铜器,积少成多的铜钱被我们卖到供销社的收购门市部后,就能买到解馋的糖果。

两块大约五十厘米长的大砖,一直在我家镇压着风箱,让轻飘飘的风箱在抽动时不至于乱动。这两块砖在我家有十几年的历史。每天在烟火的浸润下,它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膩的包浆。在电吹风机替换了风箱后,这两块砖也就不知所踪了。这两块砖是古城里的,应该是汉代的!

1988年,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杭锦旗政府的会议室做过一场关于霍洛柴登古城的讲座。他初步确定这里应该是汉代的朔方古城。这让我对家乡第一次产生了理性认识。

朔方古城的遗址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就定性在了霍洛柴登。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论断开始动摇。最终朔方古城遗址确定为巴彦淖尔市的磴口一带(也有说在杭锦旗什拉召,



一座历经几千年的郡府城池,有迁移有更换是正常的)。

“西河农令”官印的出现,让“西河”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遣卫青率三万骑,击败秦末时期返回河套地区的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部落,收复河南地。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时战时和。移民、驻军实边,建立城池一直是汉朝重要的举措。汉朝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后,又先后在长城沿线设置21个郡,其中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设西河郡。西河郡归朔方州管理。

西河郡是西汉中央政府在北疆地区驻军并移民的重点地区,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河郡共有“户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县三十六”,与云中、五原、朔方、定襄四郡相比,无论是户数、人口数还是管辖县的数量等方面,都要多数倍。其时,西汉总人口约为五千万,西河郡近七十万的人口占比着实不少。

西河郡辖区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是西汉时期重要的农业基地,被称为“新秦中”。霍洛柴登古城发现的铁农具等零散遗物,说明这一带在汉代是宜于农耕的地区。在西河郡屯垦戍边的农民,不但每年向戍守长城的几十万驻军输送大量的粮草物资,而且还为朝廷提供了大量的税收。西河郡为汉朝北疆的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发生文物盗掘案件之后,文物部门在霍洛柴登古城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铸币厂遗址。发掘出的古代钱币重达3.5吨,数量达14万枚之多。考古发现这里是一条“一条龙”生产线

和国库(窖藏)在内的铸币厂。

西汉政府一直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郡治铸币始于王莽的新朝。王莽篡权后激化了与匈奴及西域各国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战乱。大量驻军导致军费剧增。在边境城中设立造币厂,铸造钱币以给军需成为王莽的战时举措。一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军城,又因军事需要建立了一座铸币厂。错误的民族政策,破坏了北疆地区的和平局面,从而加速了新朝的灭亡。

霍洛柴登古城时代考证为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公元23年王莽死、新朝灭亡),约148年的时间。另据史料记载,由于南匈奴内乱,公元140年东汉朝廷被迫把西河郡治迁往离石(山西省离石区)。这两个事件中间的100多年时间里,西河郡的历史,书中没有提及。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北部八郡百姓逃亡殆尽,西河郡在存续309年后解体。

是什么样的事件让一座古城突然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是什么样的变故让所有人都忘记了金库中的巨额财富?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古城在短时间里遭遇了天灾之灾。像泰坦尼克葬身海底,像庞贝被火山灰覆盖——破坏是巨大的,一切在短时间里灰飞烟灭。

这应该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每一次王朝更迭,伴随的都是生灵涂炭。据史料记载,东汉初年西河郡人口从原来的近70万锐减到2万多人。

是东汉与新朝还是匈奴与汉族,亦或是土匪与官兵?不管双方主体是谁,战争都应该是毁灭性的。屠城在所难免,而且是反复的。如果不是斩草除根式的对抗,金库的信息应该会流露出来……旷野中的钱币应该是惊慌中的散落;窖藏的钱币应该是无法转移的绝望。面对一座死城人们会放弃所有的幻想。随着新朝灭亡,霍洛柴登古城的存在戛然而止。

霍洛柴登古城,始于卫青的沙场驰骋,毁于王莽的离经叛道。昭君出塞时民众应该是幸福的,城头变换大王旗时民众该是生不如死的……

说起旧事,大哥有着清晰的记忆。197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霍洛柴登实地进行勘查和发掘时,13岁的大哥刚好暑假无事,就作为临时工参与了其中的测量古城面积的工作。古城东西长1446米、南北宽1100米,大哥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加强做好古城古墓的保护工作,公社党委专门成立了文物保护小组,文物保护小组人员由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及社员组成。在那个年代,公社一级就有文物保护意识,这是何等可贵,文物保护在霍洛柴登地区深入人心。

感谢文物工作者的开发与保护,感谢《西河郡与霍洛柴登古城研究》作者编辑的辛苦付出,是你们让霍洛柴登在两千年后再次辉煌。

再去一趟霍洛柴登吧,好好感受一下古城的厚重。从旗里出发,二十公里的路程,就是一脚油门的事。

没想到,我和历史的距离竟然如此之近……

藏典籍以传文脉 守初心而铸华章

——读王占义先生《藏书余事》有感

郝振晋

我与占义先生相交多年,相知相敬,深知他是一位爱书人骨、藏书致远、读书修身、著书立心的文化行者。作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原副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北疆数十年的生态文学创作者,占义先生兼具新闻人的家国情怀、作家的文心墨墨与藏书家的文化担当,数十年如一日以书为舟、以文载道,在北疆大地书写着文脉传承的动人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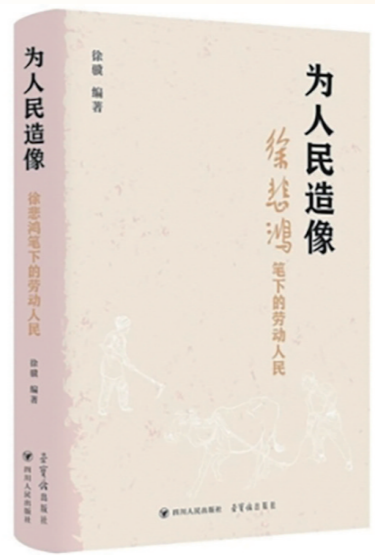
占义先生治学勤勉,笔耕不辍,著作丰硕且影响深远。他潜心编纂的《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词典》经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第一版、第二版、大字本、精华版,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引进精华版再版;《万事万物由来大词典》先由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再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引进版权再版。他与杨春风合著的《大漠流金》斩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当年我在人民日报撰写评论推介,反响热烈;独著《沙漠守望者》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合著《中国碳中和碳达峰探索绿色未来》(蒙文版)列入国家“十四五”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另有《内蒙古历史上的今天》《内蒙古之最》《批谷仓——王占义文选》等佳作问世。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三十年坚守,创办了内蒙古史料博物馆、世界报刊博物馆、毛泽东图书文献博物馆。博物馆开馆以来,他遍寻典籍、淘书集报,以私藏筑公域,让文献活起来、文脉传下去。

近日细读刊发于《人民日报·大地周刊》的《藏书余事》,这篇文章看似闲谈藏书琐事,实则以小见大,意蕴深远。占义先生以质朴平和的文字,娓娓道来半生淘书、藏书、护书、传书的心路历程,将个人藏书的甘苦、民间办馆的坚守、文脉赓续的责任,化作平实真挚的文字。文中没有华丽辞藻,却满是对书籍的敬畏、对文化的赤诚;看似记录“余事”,实则彰显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他把藏书从个人雅好升华为公共责任,把文献守护转化为北疆文化传承,字里行间藏着一位北疆文化守望者的执着与担当,既写出了读书人的精神底色,更写出了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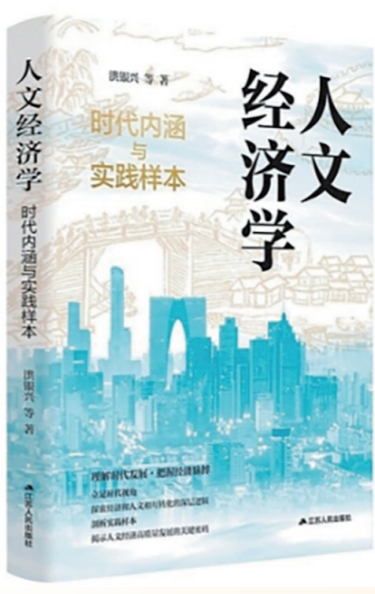
占义先生以笔墨记录北疆,以场馆赓续文脉,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书余事,实为文化大事,这份坚守令人敬佩,愿先生步履不停,让北疆书香永续流淌。

好书推荐



《为人民造像:徐悲鸿笔下的劳动人民》:徐骥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该书汇集了艺术大师徐悲鸿以劳动人民为主题的经典创作,梳理并阐发为人民造像的艺术理念。



《人文经济学:时代内涵与实践样本》:洪银兴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时代内涵、文化渊源和实践样本维度,探索经济和人文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深层逻辑。



《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张小平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书全景式记录了张雪长达25年的成长创业历程。这不仅是一部创业者的成长史,更是一次对中国制造业突破外资技术垄断、重塑自主品牌价值的深度剖析。

论娜仁高娃《醉马草》中的感知叙事

谭泽海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叙事,摆脱了过去的全知化、单一化的程式。限知视角的出现,使得读者的审美眼光更加深邃,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更加丰富、充沛,克服了全知视角对事件的扁平化处理,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富有逻辑与深度,小说家拥有了更自由、包容的言说姿态,阐释的空间也进一步被拓展。娜仁高娃的新作《醉马草》就是一部以叙事主人公盲童女孩的感知系统构建颠覆性感知体系的短篇小说。

盲童外孙女包含了多重限知视角,包括她的儿童身份,以及因视觉受限而强化的听觉、触觉、嗅觉等组合的感知体系。这样的感知体系,使得失明不再是疾病的隐喻,而是重新定义创伤与记忆的认知框架。《醉马草》以盲童为切入视角所塑造的感知叙事,对传统叙事中视觉性的垄断予以解构,将身体经验转化为抵抗沉默、反思亲情的主体性力量。

小说的开头,女孩就呼唤姥爷“把手伸过来,闭上眼,用指尖触摸我的额头”,姥爷没有伸手触摸羊头骨,女孩有了些许的失落,但她转而“左右手地摸”,寻找她的手杖,这对于失明的她几乎是片刻不能离身的器物。触觉是女孩的主体意识形成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感官通道,所以小说在开头就点出了女孩与外界事物最直接的联系。女孩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产生的互动,经由触觉的桥梁加强了联结,在视觉失效的场域中,过去与当下的叙事在女孩的身体触觉认知中成为了流动而非静止、凝固的存在。而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触觉叙述也进一步得到了延伸和拓展。女孩与姥爷到她妈妈家,进电梯后,她就开始摸按钮来判断楼层数。妈妈把她放在沙发上,她的手从妈妈身上缩回来,在半空里左右手地摸了一会儿,最后才落在了扶手上。这样的叙述,构成了对成人世界规训的抵抗。面对家庭新秩序对残障者的符号化,女孩自觉地以敏感的触觉,重新塑造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不被控制和主导的自我世界。

听觉在感知叙事中发挥的价值和作用独特的。在《醉马草》中,听觉系统并非被动接收声波的生理机能,而是盲童重构现实、挖掘历史的

核心认知工具。娜仁高娃通过声音的在场与缺席、显性与隐性的辩证关系,构建了以“沉默”为基础的听觉感知叙事,使失明者的耳朵成为穿透生活中的表象、聆听波澜起伏的探测器。首先,从小说的叙事层面出发,大量的“不可见的沉默”充斥,而女童的听觉赋予这些沉默以可感知的形态。去妈妈家的路上经历了突发的车祸现场,但车祸后用黄袋装尸体的声音被刻意地消去,只有姥爷的“打寒噤”“抬手擦去脸颊上的雨水”的声音中,显现出了死亡带给人的冰冷与恐惧。这种对沉默的听觉化处理,暗示着现代性的暴力往往以“不可见且不可闻”的方式渗透进日常生活。当听到妈妈让自己向陌生的爷爷奶奶问好时,“她微微抬起头,绷紧小嘴,眨巴着眼睛,像是在思考某个很严肃的问题”,而姥爷更是“莫名其妙地干咳一声”,打破了几个人之间尴尬的沉默气氛。这种用声音对抗视觉压迫的策略,暗示着叙事的重心从“看者”向“听者”的转移。家庭中的紧张氛围,更是通过听觉呈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卧室那边传来故意压低的交谈声”,还是女童在听到弟弟的哭喊声后,姥爷斜身凑近她的耳朵低声地告诉她,应该叫那个瘦男人“爸爸”,妈妈则从卧室出来,把一根指头堵在女孩的嘴唇上强制地让她保持安静,这些情节中展现的被压抑的“沉默”,不仅是女孩个体的创伤症候,更是女孩作为新家庭的“边缘群体”遭遇的失语状态的隐喻。

当盲童描述“将军”与天狗的决斗时,草原传统的口述史诗传统通过听觉记忆的激活被重新发现。姥爷关于醉马草“怕打雷,一打雷,一夜间就会衰败”的补充,与蒙古族萨满教中雷神镇压邪灵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互文性叙述。女童的听觉系统因此成为连接个体创伤与集体无意识的通道,她在电梯发出的“轻微的轰鸣”中,听见了来自游牧文明与现代性碰撞的震颤,这种感知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机能,升华为文化身份的听觉建构。

小说中的感知叙事还有一个独特的表达渠道,那就是女童敏感的嗅觉。女孩将雨水的气味辨认为蘑菇的味道,这与姥爷陈述的“依拉拜河那边尽是醉马草”的大旱天气形成了对比和映照。女童的嗅觉系统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主人公重新定义主体与世界关系的认知范式。

在这片被醉马草侵蚀的草原上,失明者的感知叙事,反而成为了最清醒的历史见证——正如“将军”在失明后仍守护羊群的寓言,女孩的感知恰恰照亮的是那些被遗忘的生命真相。娜仁高娃在小说中实现了双重颠覆,既解构了残疾书写的悲情化传统,又通过感知叙事的书写,让女孩的“失明”成为穿透生活当下与过去的迷雾般认知装置,在娜仁高娃简洁、有力的文字中呈现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深度,揭示出更浓厚、更辽远的意蕴。感知叙事作为民族书写的认知革命,在《醉马草》中得到了充分的言说。女童以触觉与羊头骨互动,以听觉捕捉沉默的回响,以嗅觉重拾珍贵的草原映像,这些行为不止体现出叙事架构的技巧性,更潜藏着文化身份的觉醒。从新边地书写的视角看,《醉马草》的感知叙事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去中心化”的认知范式。草原的醉马草、失明的“将军”、废弃的吉普车,这些意象经由女童的感知体系被重新编码,形成了不可忽略的“边缘凝视”。这种凝视不依赖视觉的权威,而是由身体直接与环境产生互动,将边地空间从被观看的他者转化为主动言说的主体。从民族文学层面来看,这部短篇小说重新定义了创伤与记忆的书写方式和表达话语。体现民族性的口述史诗往往依赖听觉来传承,而小说中女童对“将军”故事的娓娓道来,既体现了对根植的文化基因的延续,又是对其面临现代性困境的隐喻。娜仁高娃以简洁的语言、克制冷静的叙述,让故事的展开更具有张力,更富含深刻性。迷人的醉马草、湿润的雨季、有尊严的“将军”等活跃在草原上的鲜活意象,它们在小说的感知叙事中被重新表述,这预示着一和民族书写息息相关的叙事转向。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边地叙事不应局限于地理或族群的标签,而需要用心、用诚去深入挖掘感知叙事的可塑性和生长力,照亮那些被现代性遮蔽的温情瞬间。